

➡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

在逻辑与哲学之间

张建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32286

B81-05

27

➡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

在逻辑与哲学之间

张建军◎著



北航

C172045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81-05

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逻辑与哲学之间 / 张建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61-3674-4

I. ①在… II. ①张… III. ①逻辑哲学—文集 IV. ①B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902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25
插 页 2
字 数 409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序言

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著名学者汤用彤、牟宗三、胡世华、何兆清、倪青元、殷海光等曾在原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哲学系从事逻辑教学与研究，莫绍揆等著名数理逻辑专家也长期关心与支持哲学系逻辑学科的发展。1960年南京大学恢复哲学专业之际即设立了逻辑学教研室，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3年获得逻辑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以来，南大逻辑学科获得了长足发展。2001年开始招收逻辑学方向博士生，2002年获得逻辑学博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以本专业为主体设立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2008年入选江苏省重点学科（哲学一级重点分支学科），2011年入选江苏省优势学科工程，2012年设立逻辑所思想分析实验室。自1960年以来，先后在南京大学哲学学科从事逻辑学教学工作的有林仁栋、郁慕镛、李廉、李志才、郑毓信、吕植壮、王义、张建军、蔡仲、杜国平、王克喜、潘天群、顿新国、陶孝云。亦曾聘请美国学者孔斯（R. C. Koons），澳大利亚学者普利斯特（G. Priest），日本学者金子守，法国学者博列尼菲尔（O. Brenifier），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文方等开设逻辑课程。逻辑学位点设立以来，李廉、李志才、郁慕镛、张建军先后担任学科带头人；先后担任逻辑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的有李廉、李志才、郁慕镛、张建军、杜国平、王克喜、潘天群、顿新国；先后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有张建军、潘天群、王克喜。迄今逻辑学专业共授予硕士学位81人（其中20世纪80年代12人，90年代15人），授予博士学位29人。现有在读硕士研究生15人（含美国留学生1人），在读博士研究生

22人。逻辑学专业亦接受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研究人员,现有在站博士后3人(崔晓红、王艳、郝旭东),已出站2人(张力锋、张立娜)。人才培养成绩显著,以马雷(1991级硕士生,现任东南大学教授)、杜国平(1995级硕士生,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叶涛(1999级硕士生,现任燕山大学教授)、顿新国(2002级博士生,现任南京大学教授)、王习胜(2003级博士生,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教学科研骨干活跃于学术界。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毕业生也以较强的理论素养、社会责任感和实际工作能力获得了广泛好评。

多年来,南大逻辑学科同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敬业精神从事逻辑教育工作。在哲学专业本科逻辑教学,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教学,全校逻辑基础课、文化素质课与通识课教学,以及多层次逻辑教育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与此同时,本学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师生的逻辑理论与应用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在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学界广泛好评。特别是“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成立以来,本学科适应当代逻辑科学发展趋势,致力于组织专兼职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展开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多视角交叉互动研究,设立了六大主要攻关领域:(1)现代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及逻辑思想史研究;(2)逻辑与哲学的交叉互动研究(含逻辑哲学、辩证逻辑研究);(3)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含人文社科方法论)的交叉互动研究;(4)逻辑与认知科学及人工智能的交叉互动研究;(5)逻辑与语言学的交叉互动研究(含非形式论证研究);(6)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多层次逻辑教学现代化研究。近期又开拓出“思想分析与哲学践行”的研究方向。经过十余年发展,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诸多新的进展,形成了一支年富力强、学风严谨、富有活力的学术团队,国内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研究方向具有明显特色与优势,学科整体水平在国内同学科中位居前列。十余年来,本学科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7项(含重点项目1项),教

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4项（含重点基地重大项目2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国家和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5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项，荣获金岳霖学术奖3项，荣获教育部、江苏省和中国逻辑学会优秀成果奖励12项。张建军入选中央实施“马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杜国平、王克喜入选课题组主要成员，潘天群、顿新国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旨在展示南大逻辑学科的研究特色及系列成果，以与海内外学界及广大读者交流。首批书目四册为南大逻辑学科四位现职专任教授的论文自选集，请学界同仁与识者予以关注，并欢迎展开交流、切磋与合作。

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学科负责人
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

张建军
2013年9月于南京

目 录

《南京大学逻辑学文丛》序言	(1)
---------------------	-------

真正重视“逻先生”

——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	(1)
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	
——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	(4)
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构想	(16)
逻辑与宗教对话	(22)
共创中华逻辑科学繁荣发展的时代	(29)
关于全面实现“逻辑教学现代化”的几点认识	(37)

走向一种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

——逻辑观两大论争的回顾与反思	(49)
深入把握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脉动	
——读《逻辑学思想史》	(67)
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	(78)
论后期金岳霖的逻辑真理观	(84)
也谈传统演绎逻辑与经典逻辑演算的关系	(102)
再谈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关系	(116)
从形式蕴涵看“实质蕴涵怪论”	
——怪论定理之“反例”化解路径新探	(122)
论关系命题的逻辑方阵与逻辑方阵	(137)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辨析	(153)
逻辑全能问题与动态认知逻辑	(165)

逻辑悖论与科学理论创新	(172)
论作为语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	(196)
广义逻辑悖论研究及其社会文化功能论纲	(209)
集合论悖论的辩证分析	(218)
不相容逻辑与“矛盾”理论	(230)

开掘逻辑学的方法论价值	(241)
论当代应用逻辑学科群的崛起	(245)
我国科学逻辑研究的开拓与创新之路	(254)
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历史发展	(260)

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构图	(280)
论《费尔巴哈论》中“唯物主义”的双重语义	(300)
评波普尔和邦格对辩证法矛盾观的批判	(316)
关于“分析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几个问题	(326)
论金岳霖哲学思想历程的四次重大转折	(342)
系统把握“五四之子”的思想建构 ——《殷海光哲学与文化思想论集》导言	(351)

后记	(373)
----------	-------

真正重视“逻先生”

——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

逻辑学具有基础学科、工具学科和人文学科三重性质，这是逻辑学在当代科学体系中独有的特征。数学既是基础学科又是工具学科，语言学既是工具学科又是人文学科，但它们都不具有逻辑学这种“三位一体”的学科性质。

逻辑学发展成为与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生命科学等相并列的基础学科，是 20 世纪科学系统演化的重大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对此予以确认。后来在该组织发布的“科技领域国际标准命名法”中，更把逻辑学列为一级学科之首。然而，要真正形成发展逻辑学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实现我国逻辑学所应有的繁荣，还需要进一步深刻认识逻辑学的另外两重学科性质。

逻辑学是一种系统性工具。亚里士多德曾视逻辑学（他本人称之为“分析学”）为纯粹的工具性学科，虽然在其学科分类体系中未给逻辑学一席之地，但亚氏已经认识到，逻辑绝不仅仅是说话辩论之利器，更为重要的是，逻辑乃一切科学研究的必备工具。这个认识是亚氏创建逻辑学的基本动因，《工具论》中的《后分析篇》开了把逻辑转化为方法的先河。而作为一种系统性工具，逻辑的价值也绝不仅仅体现在对一些零星规律与规则的运用上。现代逻辑达到形式化、系统化的极致，是逻辑得以在现代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语言学、心理学、量子物理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得到广泛而卓有成效应用的重要原因。现代逻辑的系统应用，需要一批既精通现代逻辑基本工具又能把握具体学科领域前沿知识，从而能把逻辑工具得心应手地运用到具体学科中去的“系统转化型”人才；同时也需要当代逻辑工作者继承《后分析篇》传统，对逻辑工具在科学领域综合运用的元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把握。在后一方

面,我国学者在“科学逻辑”的名义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逻辑学具有人文学科性质,这是指它不仅作为一种人文存在(任何学科都是如此),而且学科对象本身即具有人文内容。对逻辑学的这种性质的指认,可追溯到古希腊斯多亚学派和中世纪逻辑研究高峰时期的学者,这也是近代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共识。现代逻辑基础理论的发展,曾一度使消除逻辑的人文性质的观点占据西方学界的主导地位。我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迄今仍坚持这种观点。然而,纵观20世纪后半叶西方逻辑学科的发展历程,随着逻辑语用学研究的迅速崛起、符号学研究人文层面的蓬勃发展、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兴盛、科学社会学研究的拓展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形式理性”的批判等诸多因素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人文内容已在逻辑学研究中实现了回归。即使在纯粹的“哲学逻辑”研究上,当代西方逻辑学界也基本上遵循P. F. 斯特劳森的划分,从形式-系统研究和非形式-哲学研究两个方向上展开,而正是后一个方向上的发展,提供了分析哲学语境中的“逻辑研究”与胡塞尔型现象学语境中的“逻辑研究”(这是当代人文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的对话途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B. 巴伯在其名著《科学与社会秩序》中,在从“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角度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强调指出了逻辑的基础地位。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这是逻辑学最根本的人文性质。“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严复曾有如下断言:逻辑“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和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新世纪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不妨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因为在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一系列“无序”、“失衡”、“失范”现象,实现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和有序化、规范化方面,“逻先生”有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纪我国逻辑学科发展战略应为“一体两翼”:以基础理论层面研究为体,以工具层面和人文层面研究为翼,努力形成有利于“逻先生”茁壮生长的社会文化生态与氛围,使各种不同风格的学者各展所长,优势

互补，共同振兴逻辑事业。这也有利于逻辑学在我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

〔（原载《人民日报》2002年1月12日理论版，转载于《逻辑》（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2期，曾在首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2002，台湾大学）做大会报告）〕

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

——关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对话

张建军（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1月12日，我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新世纪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由于“逻先生”这个提法比较新鲜，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和回应。在五四运动85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赵虹主编约我在《社会科学论坛》谈谈这个问题，并最好采用与学界同仁对话的形式。斌峰兄，在逻辑学界同仁中，你长期致力于五四精神研究并发表过许多重要见解，同时我们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也已表现出了在逻辑的性质、功能与作用等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我想，我们就此话题展开对话会更有味道。

张斌峰（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很高兴接受你和杂志社的邀请。首先我要表示非常赞同在当前中国文化语境中明确打出“逻先生”的旗帜，同时我也很欣赏大作中的如下论断：“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性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这是逻辑学最根本的人文性质。‘逻辑精神’既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要素。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这样的论述很精辟，指出了逻辑与科学、民主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是“逻先生”与“赛先生”、“德先生”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一点在中国学界还远不是“公共知识”。五四精神的核心无疑是民主与科学，而只有深刻正确地认识与理解逻辑才能深刻正确地理解民主与科学。但我主张对这里的“形式理性”应作广义理解。随着理性多元化时代的

到来，逻辑学不仅要覆盖科学的事实世界，而且还要覆盖价值的规范世界，我们不仅要继续对事实世界的科学的逻辑构造，更要展开对生活世界、价值世界、交往世界、情感世界的逻辑构造，逻辑学不仅是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而且也应当是沟通理性（交往理性）、心性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的体现。所以，我很赞赏大作中关于逻辑学是基础学科、工具学科和人文学科“三位一体”的认识，特别是其中对逻辑学人文学科性质的强调。我也赞赏你关于开展逻辑社会学研究的倡议，因为在克服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一系列“无序”、“失衡”、“失范”现象，实现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和有序化、规范化方面，“逻先生”的确有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建军：其实我原来的文章的题目就是现在的副标题，正标题是《人民日报》的编辑从文中提炼出来的。文中重点强调的是逻辑学的人文学科性质，但其另外两重性质同样至关重要。逻辑学发展为与数、理、化、天、地、生相并列的一大基础学科，是20世纪科学系统演化的重大进展。而这一点在国内学界远未得到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体现。在逻辑学的工具学科性质方面似乎分歧不大，但在国内学术语境中对于逻辑的方法论功能也存在诸多误视与错解。只有全面把握这三重学科性质及其相互关联，才能完整地认识现代的“逻先生”。不过，你的上述谈话也已显示出我们有所分歧之处：我所使用的“形式理性”概念恰恰取其狭义，即由演绎逻辑所揭示的基于演绎结构的推理理性，或者如皮亚杰和沙青先生所称谓的“分析性理性”。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谈。你作为主攻中国逻辑思想史方向的学者，还是请你先谈谈五四时代国内逻辑学的状况吧。

张斌峰：五四作为新文化运动，其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主要平台首推《新青年》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引介西方逻辑的论述，如吴勤著文所称，介绍西方逻辑之学，“莫如候官严氏所译名学。约翰·弥尔原著，为逻辑学空前佳作”。张申府发表介绍罗素的“新学”和“新方法”，其“新学”就是数理逻辑，新方法就是“逻辑的和分析的方法”。王星拱《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说》，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等文，俨然像“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一样，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新学术”之再造的“新思潮”精神，乃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再造的手段就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而所谓“学理”就是科学的方法。

张建军：那么，他们说的“科学方法”是指什么呢？它和逻辑有什

么关系？

张斌峰：科学的方法的实质就是逻辑和逻辑方法。逻辑无疑是五四时代的宠儿。王星拱的《什么是科学方法》一文明确指出：“自孔德实证主义，穆勒实现逻辑革命以来，科学方法之重要，渐渐所承认了。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说，就是实质的逻辑。”这种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这种正当方法，既不是纯演绎性的，也不是纯归纳性的，而是基于事实的分析与选择，经过合法的推论和对推论结果进行试验。王星拱本身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拥护，直接根据于其科学研究的实践。他强调科学是学问，不是艺术；科学的本质是研究自然事实，不是在文字中打转。胡适则特别强调科学中的“实证”精神，把科学同坚强的证据联系在一起。不过，他们承认有许多东西并不根据于实证，逻辑推理也能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结论。对胡适和当时的陈独秀等人来说，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运用到一切社会领域中，可以用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

对于根本上缺乏近代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中国来说，大力倡导科学，接受西方的科学遗产，使中国科学获得发展，实现知识领域的变革和转型，是确立“现代性”所必须具备的东西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新青年》高举科学的旗帜，强烈拥护和传播科学观念和精神，无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但是，他们对科学本身缺乏某种检查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对科学本身的“有限性”有所自觉，而是把科学方法膨胀为无所不适、无所不能的“万能之药”。“科学精神”包括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信仰的领域。但是，《新青年》知识分子，却把科学神圣化、偶像化，使之成为一种新信仰的对象，这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悖论：怀疑的、合理的、批判的、非信仰的科学，却向非怀疑、非合理、非批判、信仰的深渊沉沦。一切都被“科学化”：“科学工作”、“科学生活”、“科学态度”、“科学安排”、“科学指导”、“科学人生”等等。人们就像中了魔一样的张口“科学”、闭口“科学”。可是，真正的“科学”就在这轰轰隆隆的一片噪声中隐去或消失了。

五四时代将逻辑视为科学的权威形象，并使之承担其价值系统的功能，“科学万能论”就自然导致“逻辑万能论”，视“逻辑”为点石成金的“金手指”，这反而妨碍和限制了“后五四时代”逻辑学的发展。因

此，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就必须突破五四时代对逻辑的理解，对逻辑的本质、地位、作用和功能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地促进逻辑学科的发展，使逻辑学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民主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完成五四未尽之任之必需。

张建军：你这番话讲得很精彩，但我觉得尚需对问题做细致的辨析。如你所说，把逻辑与科学神圣化、偶像化，恰恰是与逻辑精神、科学精神相违背的。但我对五四时期有“逻辑万能论”存疑。与其说有“逻辑万能论”，不如说有“万能逻辑论”，这个“万能逻辑”就是杜威的实验逻辑，或者王星拱所谓“实质的逻辑”。这种逻辑只是表面上与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的“科学逻辑”类似，实际上与后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演绎逻辑而且是现代演绎逻辑基础之上的，而前者却是以批判演绎逻辑的面目出现的。胡适曾明确断言：“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现通译‘形式逻辑’），单教人牢记 AEIO 等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做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这种直接来自杜威的观点，显然是历史上的归纳主义者对演绎逻辑的批判的一种呼应。而你刚才提到的在五四时期影响颇大的严复所译《穆勒名学》，包括他的另一译本《名学浅说》，都是归纳主义的代表作。而张申府对数理逻辑的介绍在当时几乎无人理睬。即使罗素本人的来华讲学也未能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当时中国学界在学崇逻辑的同时，却到处弥漫着对演绎逻辑的批判与轻蔑。这是逻辑学东渐过程中的一个极大的不幸，造成了国人对逻辑的认识上的极大扭曲，对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认为，逻辑学不仅在五四时期没有真正成为时代的宠儿，而且迄今为止它在中国也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地位。

张斌峰：这使我理解了你强调将形式理性作狭义理解的原因。的确，演绎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可谓命途多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不相融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感观不能证实的事物，常常不能把它看作可用某种逻辑解决的问题，于是，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诉诸历史，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表现出纯粹理性的地方，它要求一切形式的推理都要同物质世界的实体直接有关，要求一切可靠的方法都应在实用的层面上生效。这种诉诸历史和经验的传统，使得五四时代的中国

知识分子对科学作了归纳主义的理解。如你所说,无论“拿来证据”还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的实质就是归纳主义。这也当然导致了对西方逻辑的片面理解,甚至误读。

如果我们以西方逻辑及其所代表的思维方式作为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面镜子,就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展中,的确缺少西方那样的逻辑与知识论的思考方法,认知与抽象的思考不足,偏重于道德价值的判断与评价,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中科学与知识论的不发达。可以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我们以西方的科学、逻辑去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思维方式的缺陷与不足。

但是,如果你把形式理性只定位在“演绎理性”,这是否会导致对“逻先生”的另一种片面的解读呢?

张建军:“逻先生”的概念是相对于德、赛两先生而提出的。我的基本观点是,要改变国人在德、赛两先生的认识上的诸多扭曲与变形,关键在于重新认识和深入把握演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任强在今年《社会科学论坛》第2期发表的《殉道与升华——从苏格拉底之死解读民主与法治的流》一文很值得一读,苏格拉底这位能够娴熟地运用归谬法论证知识相对性的“绝代圣人”,却是“智者为王”的专制政体的鼓吹者,到柏拉图更发展为“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然而,他们的学说传到亚里士多德来了一个大逆转,亚氏主张现实中的最佳政体是由多数人统治的立宪-共和制。虽然他留了一个师承的“尾巴”,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这样的君主制:公民被一个在各方面都是最卓越的人统治,并被当作自由人来统治。但他认为这样的政体很容易蜕变为暴君专制,绝非现实的最佳政体。这种逆转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以推理与论证的有效性研究为核心的演绎逻辑的创生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至于“赛先生”,众所周知,除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演绎逻辑学之外,第一个真正的科学系统——欧几里德几何学就奠基基于演绎推理的基础之上。

张斌峰:但我们所说的“赛先生”主要指近代经验自然科学,而没有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就没有近代科学。

张建军:诚然如此,但中世纪经院哲学所蕴育的演绎逻辑的恢复与发展构成了近代科学的必要基础,这一点今天已成为西方学界的共识。反观你刚才谈及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我们能从中找到多少精华与优长,但演绎逻辑传统的缺乏,无疑是一个必须补救的文化缺陷。冯契是长期致力于

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哲学家，但他也精辟地概括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固有缺陷，那就是“经学独断论与权威主义”与“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两种思潮的共同特点就是不讲逻辑，在这一点上可谓两极相通。其实，这两种思潮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也都存在，但是被演绎逻辑传统给予了强有力的制约。

张斌峰：你的观点与自称“五四之子”的殷海光的观点本质上相通，他在其学说的成熟时期一直只承认演绎逻辑是逻辑，并主张运用演绎逻辑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记得你曾经在《哲学研究》发表《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一文，其中批评殷海光的逻辑观过于褊狭，这篇文章曾收入我主编的《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之中。你现在的观点与你以往一再表示赞同和提倡的大逻辑观是否矛盾？

张建军：不矛盾。我的认识是，演绎逻辑乃“逻辑之本”，有本必有末，但不能本末倒置。任何大逻辑观之“大”都是在演绎逻辑基础上的扩展，这已被 20 世纪逻辑学的大发展所证明。其实，殷海光本人也并非不知道各种广义的逻辑观，但他在其成熟期的研究中愈益深切地感到，只有认清逻辑的“本格”对象为演绎推理，并且把演绎推理训练作为“逻辑养成教育的主体”，才能纠正盛行于中国学术界并造成许多不良后果的对于逻辑学与非逻辑学科的混淆，特别是把逻辑学混同于心理学、文法学、知识论及形而上学（玄学）的倾向。他认为，这些混淆阻碍了现代演绎逻辑在中国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在中国学界的引入和广泛运用。你是殷海光研究专家，对此一定非常清楚。

张斌峰：的确如此。我感到，你的“逻先生”概念的提出是直接受殷海光影响的结果。

张建军：殷海光是系统阐述演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第一人。他关于演绎逻辑乃“天下之公器”的论证对我影响很大。他把演绎逻辑作为“跟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褊狭思想、独断教条作毫无保留的奋战”之利器的论述，可以使人深刻地感受到逻辑之于“德先生：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关于“赛先生”，他给出了如下著名的假言连锁推理：“中国要富国强兵必须发展工业；中国要发展工业必须研究科学；中国要研究科学，必须在文化价值上注重认知特征；中国在文化价值上要注重认知特征，最必须而又直截的途径之一就是规规矩矩地学习逻辑。”从大家都关心的富国强兵出发展开论证，可谓用心良苦。